



在上海进博会,我感受中西交汇的器物文明、多元文化;在国家博物馆,我感受改革开放的时代脉搏。回望40年来家国,正是无数个体命运的改变,正是市场经济对人性与制度力量的释放,启蒙了我们的思想,开启了改革的时代进程。

# 回望我的乡土中国

## ——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

杜士林

### “两江杯”我与改革开放40年 征文大赛

重庆两江新区党工委宣传部  
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
重庆晨报传媒有限公司  
重庆晚报  
联合主办



最近乡里开始修起家谱,看着那一个个家族祖先的名字,从唐朝的长安一直到湖北,从湖北再迁徙到重庆,一幅幅宏阔的人生画卷在我的脑海里慢慢的形成。

黄仁宇先生主张以大历史观理解中国社会,解读中国历史,的确如此。回望改革开放40年来的历程,时代的宏大叙事总显抽象,从土地承包、乡镇工业、到城市改革,抑或是中国的市场化、工业化、城市化、全球化、信息化进程,改革开放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改变,对个体家庭命运的改变,总让人感怀!



站在故乡合川肖家镇上马寺山上,川北连绵起伏的丘陵像浪花一样,一浪浪延伸天际,远处就是大巴山余脉华蓥山。在山的北面,就是小平故里广安。在不远处就是我的家乡平桥村,如今平桥村已然成为一个消逝的地名,并入了新学村——卢作孚先生的祖籍地。

1961年,作为回乡青年的父亲开始登上了平桥村的村落政治舞台。这个有着800多户人家的村落有2000亩地,5个生产合作社,土地肥沃,物产丰富。就是在2006年的重庆百年大旱,故乡的水井都还有甘冽的泉水。

在父亲的坚持下,1966年,一家大小搬到了上马寺山脚下一个叫半边街的地方。这是父亲第一次当家做主而主导的搬家,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,兴修房屋是一件大事。22岁的父亲接过爷爷主持了40年的家政大权,在朋友的帮助下,开始修房。每天的工钱是1.2元,请了4个石匠安放奠基的石头。父亲的好友,一个叫蒋严碧的朋友在肖家人民公社供销社工作,他曾经与父亲颇为相投。

蒋先生给了父亲每天2斤酒的定量,在缺少物资的1960年代,2斤酒对农民兄弟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。平地基,夯土墙,不久,花去100多元后,四间土坯房就修好了。

我在这个茅屋里整整生活了10年,直到1985年。茅屋冬暖夏凉,但因为矮小,屋子里总是通风不畅,灶台上蒙了黑黑的一层油,柴火的烟气就四散开去,一餐饭做下来,常常要花去2个小时,我的母亲就这样把青春熏染得无影无踪。但茅屋温馨,在下雨的时候常常看到房前的茼蒿一天一个样,充满了生机,伴我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时光。

村里安排父亲去佐面,这可能是当时村社唯一的手工业了,每销售100斤,可以计工分10分。为了多销售,父亲搞起了代理制,在全村设了十个点,也给人家一点好处,这样,他的工分就比较可观了。在童年时代,晚上我总是悄悄被母亲叫醒,喂上几口面,成了我最美好的记忆之一。

为了贴补家用,父亲总是很晚还要编织竹篮。在昏黄的油灯下,父亲用细细的篾丝编织着一家的零用钱,一个竹篮,需要编大半天,却只能卖1毛5分。到上世纪八十年代,卖到5毛。在生活的变迁里,父亲一天天老了,我们则逐渐长大。

1980年代初,平桥村开始土地承包,乡亲们的积极性空前释放出来,虽然农村的生计还是艰苦,但吃饱饭的农民开始有了更多的想法。

1985年,父亲作出了修房的决定,要为我和大哥娶媳妇作准备。花去800元,修了三间大瓦房。可是钱不够,只有用竹竿代替木头,承接着瓦的重量。

人多地少,在土地之外,父亲把目光放到了蔬菜种植上。

从1993年开始,家里种植了大量的蔬菜,高峰时期,有近10万斤。凌晨4点,父亲、母亲和大哥就起来办菜,然后一筐筐挑到镇上,常常要挑1000多公斤。放了假,我也加入到挑菜的行列中,常常把肩头磨得鲜血直流,然后结痂,再磨破,经过10来天的磨合,再干上一阵,也就适应了。

1990年,父亲再次修房,这时,我正读初中,大哥已经20岁了,必须得筑巢引凤,娶媳妇了。他亲自带大哥去相亲,抓紧修房子。花了四个月,终于修好,大嫂也上了门。作为家庭大事,父亲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。对一个老农来说,这大约是父亲一生的高光时刻,没有什么比修房了却孩子婚姻更大的事了。



1994年,我参加高考,在三江交汇的合阳城,对未来的迷茫让我对生活没有把握,但还是有一种深深的期待。在考试要完的时候,我买了一本书,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。

我没有想到,书中出现得最频繁的词汇与我的生活紧紧相连,比如记者,比如中文,比如大哥,惊人的相似。让人真的很怀疑命运是否早有安排。

20多年过去了,我终于明白,对于10年前的农村孩子,如果你成绩不是足够好,但还可以,那你就差不多是这样的一条道路。这是中国社会的一种制度性安排,但没有几个人真正读懂。

30年前路遥成书的时候,实际上与20年前的我在成长道路上没有多大的区别。

20年前,我走在向往城市的路上,20年后,我走在反思城市的路上。

在城市里,我常常想起故乡的高粱地,想起那些满山遍野的绿色禾苗,那些层层叠叠的梯田,那些沉淀了很多往事的破落的宅院。在虫声编织的宁静世界里,感受时光缓慢的流过故乡的河流。

岁月呵……

1997年,重庆直辖。7月5日,我与大哥一道把最后几筐西红柿挑到了镇上销售,农村市场就要开始疲软了,但没有几个老乡知道,我也不知道。

毒辣的阳光把我晒得油黑,我知道,这基本上是我最后一次帮父兄干农活了。从此,我就要开始另外一种不同于农民和学生的生活了。

1997年7月6日,我到重庆上班了。在缴纳了1万元入城费后,我获得了城市户口。

如今,户口这个奇怪的东西,再也阻挡不了乡亲们的步伐了,更多的农民子弟可以进入城市了。2007年,在我曾经工作的区,也出台了一些针对民工的优惠政策。在经历20多年的艰辛历程后,农民工获得了城市建设者的称号。

从1997年到2005年,进入城市的生活是愉快的,然而,不过几年功夫,我得为自己是一个农家子弟埋单。因为父母没有医保、社保,在城市化的历程里,我们的亲情因此显得沉重而深情。

2006年底,大哥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。可是,孩子一出生就不对劲,在医院抢救了一次,花去8000元。一个农民一年在家的可支配现金收入也就1000多元,怎么能够应付得过来,赶快掏钱救急吧。

1993年,大哥与大嫂开始出门打工,4次出门,终于在2003年的时候收获了1万2千元的存款。不料,一夜就用光!我看见大嫂的眼里散出一丝愁苦的光芒。

生活的重负再一次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了。孩子的病成为一颗定时炸弹,随时把父兄卷入愁苦的生活里。而自己的生活还得继续,也许这就是众多农村进城大学生的宿命吧。一边是沉甸甸的亲情,一边是沉甸甸的责任,亲兄弟明算账并不适于我们。



时间总是治疗心灵创伤的良药,生活还要继续。再后来,重庆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。作为一名记者,十年来累积在心中的疑问却慢慢在脑海里徐徐展开——我们的生活为什么总是容易陷入困境。

有太多的三农问题专家和经济学家为此开出了药方,作详尽的分析——农村公共产品的稀缺、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设计,已经为中国农民的命运作了安排。在市场经济没有到来之时,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只有通过当兵、升学和有限的招工来解决农民的身份问题。

是改革开放,是市场经济的大潮开启了世界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城市化进程。2亿多农民工成为这个世界工厂的主体,他们成为最早感知市场曙光的人。

2007年7月5日~10日,我到杭州、千岛湖、黄山、南京参观。稠密的人口和连绵的工厂正彰显着我们生产制造产业的蓬勃气势。我的大哥、大嫂曾经就是其中的一员,加班一小时,不过2元。在10多年的农民工生涯里,并没有挣到什么财富,反而让大嫂感受到了城市生活的美好和巨大的生活落差。既然不能改变世界,那就改变自己吧。两个年轻人努力多年,除了互相埋怨,在城市里一无所获,甚至在一家著名的连锁企业里出了工伤,也还得我这个弟弟去讨一个公道,否则,也就算了。

农民和农民工在漫长的中国社会变革中发挥了重大作用,但作用和地位却不对称。不但影响到农村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发展,实际上农民工问题已经牵涉到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战略全局问题。这个问题不解决,国家的繁荣和稳定,也就是一句空话。40年来,正是城乡社会的不对称,正是农民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,成为中国社会改革的强大动力之源,成为社会转型期波澜壮阔的复杂背景。

当务之急,是首先解决好农民工如何更好融入城市,和谐发展的课题。我向市委市政府提了建议。

三个月后,重庆设立了农民工日。听着电视直播里播出了我草拟的讲话稿:“农民工是城市英雄、是建设功臣,是民族脊梁!”我不禁热泪纷飞。这是半个世纪以来城市对农村最深情的问候。一个国家,一个地区,只有民众拥有了更多的民主权益,我们的社会才能充满无限的活力。

2002年,重庆大学城在陈家桥镇白鹤村奠基,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,我见证了大学城的迅速崛起。

2010年,两江新区成立,我加入到这个团队中,更加直接感受到重庆城市化、工业化的脉搏。以两江新区开发开放为标志,不沿边不靠海的重庆,迅速走出一条内陆地区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的新路。

在推动沿海开放的同时,中国开始把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目光锁定在广袤的中西部。跨国企业在布局重庆的同时,也把全球产业链、价值链、供应链的发展路径与方式带到了重庆。中央扩大内陆改革开放的决策,全球资本逐鹿内陆市场的力量,本土工商资本的崛起,地方政府着力城市化、工业化的力量,多个力量融合,渐成气候。

身处其中,变化巨大而浑然不觉。如今龙兴、鱼复、水土已然是沧桑巨变,整个两江新区更是变化巨大。我更在意的是这里的38万转非民众,如今他们中的大多数,已经融入城市,成为了城市市民,我为他们生活的改善而高兴。

从两江国际汽车城到航空航天产业发展,两江新区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。韩国KBS拍摄了一部超级亚洲纪录片,我向他们推荐了亚洲之路——一粒咖啡豆背后的全球供应链之变。来自东盟、云南的咖啡,经过长江黄金水道,经过果园港、中欧重庆班列,到达欧洲。这个故事的背后,是重庆的区位之变,观念之变。山水之城重庆,依托母亲河长江,得以联结富裕的中国沿海与欧洲市场,成就自己的改革传奇。

在上海进博会,我感受中西交汇的器物文明、多元文化;在国家博物馆,我感受改革开放的时代脉搏。回望40年来家国,正是无数个体命运的改变,正是市场经济对人性与制度力量的释放,启蒙了我们的思想,开启了改革的时代进程。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复兴只有与普通人的幸福联系在一起的时候,我们的国家才是立体的、感性的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两江新区党工委宣传部)

